



何道宽 著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He Daokuan

凤兴集

闻道·播火·摆渡

復旦大學出版社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Subsidized by Shenzh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Scholarly Monographs

凤兴集

闻道·播火·摆渡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He Daokuan

何道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序一 他为人类才智的地球村铺路

保罗·莱文森

近日,我对自己的著作在世界各地翻译出版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检视,发现我的书已经翻译成了 15 种语言,翻译成汉语的书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我的中文版译者是何道宽先生。

我不通中文,但我百分之百相信,他的翻译堪称完美。之所以知道他译文之完美,那是因为他在翻译过程中与我切磋的问题。他的问题具体明确、切中肯綮,就像出自自己的脑子一样。

你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全身心投入的学者。翻译一本书时,他视之如同己出;他始终将译事视为自己的生活。我任何时候都可能收到他的邮件,子夜、凌晨,24 小时任何时候收到他的邮件,我都不会感到意外。他似乎在 24 小时连轴转,不知疲倦为何物。时区差异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脑子里始终亮着灯。

记得初次接到他的邮件时如晴天闪电,我实感意外。他说想翻译我的《数字麦克卢汉》。我欣然同意,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他翻译我的学术书的第一本,随后他还要翻译我的六本学术书,其中的《莱文森精粹》还是在他的提议之下由我们两人合作编订翻译出版的。

如今,有机会为他的自选集写序,我感到特别高兴。他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那就是他对超越一切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的核心理念的理解。

说何道宽是翻译家实在难以充分表现他的全部成就。他真是一位艺术家,他的译作本身就是重要的作品。道宽先生的一些译作远比我的著作复杂。他翻译了麦克卢汉,将这位跨越古今的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的智慧引进中国。

早在 1962 年,麦克卢汉就指出,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里。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应该是人人能分享一切信息的圣地。1962年，多少中国人能阅读英语撰写的传播和媒介的学术著作呢？不多。今天，这不再是问题。道宽先生完成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的著作翻译出版工作，他的译作正在为21世纪名副其实的人类才智的地球村铺路。身为他介绍的媒介理论家中的一员，我每日每时都对他心存感激。每当一位中国学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的书时，我仿佛就能看到道宽先生辛勤耕耘的重要果实——中国学生向我通报这方面信息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了。无疑，他们中有些人很快会撰写自己的著作了。

我们日益深入这个令人惊叹的世纪。我知道，何道宽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敬重。他是真正的先行者，他把传播和媒介理论引进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2013年1月

序二 我看“何道宽现象”

吴予敏

今年是年轻的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周年，也是我最尊敬的学长何道宽教授学长七十一寿辰，还是何老师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周年。这三个不寻常的日子恰恰合成了一体的纪念。

何老师将他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文章集成《夙兴集》，承蒙他的看重，让我写几句话作为一篇序。且不说他的这部几十万字的内容广博的文集，在此背后，更有他的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学术译著——在这样的由辛勤汗水和虔诚心血所累积起来的文化高地面前，我怎好意思插上一片轻飘飘的风旗呢？实在是没有这个资格和分量的。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何老师的盛情来写下一些感想。这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在深圳大学这所年轻的特区大学里面出现的让全国学术界都瞩目的“何道宽现象”是有着某种深意和特殊价值的。我希望在此谈一点个人的领悟。

何老师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深圳大学任教的。1993 年 3 月，学校在《光明日报》上向全国张榜招聘教授，何老师欣然应聘，从四川奔赴特区，支援年轻的特区大学。那时的深圳大学刚刚走过了发扬蹈厉的改革起步期，正如告别童年开始了青春期成长的困惑和痛苦的阶段。何老师是外语系的顶梁柱，将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翻译、英美文化、比较文化研究带到大学的课堂。我认识何老师的时候已经是 1997 年，外语系和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两系合并成立文学院。何老师任文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他对教学管理工作的一丝不苟，对青年教师的循循善诱，对学科建设的孜孜不倦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被公推为副会长。我本人曾经是受何老师领导的中青年教师，得到他的指

点和帮助也是难以尽述的。我还记得，何老师年届六十退休的时候，文学院同仁赠送给他的一块雕字的红木金匾上刻着“先生之德 山高水长”，恰切地表达了大家共同的感激。

我想说的“何道宽现象”主要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办理退休手续以后的这些年。屈指算来，也仅仅只是十年的光景，何老师为我们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贡献了多少心血呢？整整一千五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大量的经典著作翻译，还有论文、讲稿、序跋。平均下来，每年是一百五十多万字，每天近四千字的作品！除去他的教学、读书、访问、讲学、会议以外，就是伏案写作，写作！除了吃饭和睡觉，他的全部时间完全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他的作品很多都成为学术界的抢手货，一版再版。这样异乎常态的学术生产，必有异乎常人的精神动力。

何老师将他的这本文集命名为《夙兴集》是非常合适的。古语道“夙兴匪懈”、“夙兴昧旦”，描写的就是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工作的人。知道何老师工作习惯的朋友都知道，他大概是深圳大学校园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通常情况下，大约凌晨四点钟，何老师就已经起身，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开始了一天的笔耕。他的文字是伴随着杜鹃山的鸟鸣和粤海湾的晨曦诞生的。这当然是最新鲜的文字，浸润着最活泼的生命。何老师的文字是在和他的时间赛跑，毫无疑问，文字跑在了他的年纪的前面，跑在了所有年轻人的前面。庄子曾经说过，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他是悲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搞不好在有些人那里也会成为懒汉主义的遁词。而何老师却是反庄子之道而行之，以有涯追无涯，乐矣，乐在其中矣！他多次对我说，我几乎没有别的爱好，做学问、搞翻译就是我最快乐、最充实的生活。

对学术工作全身心的投入，源于对知识全身心的热爱。何老师所涉猎的学术领域是那样广阔：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翻译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如果没有广博的学术视野，也就不会有敏锐准确的学术鉴赏力，自然也就不能传译域外学术精品。我还记得第一次随何老师出访英法、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博物馆的情形。他对着展品跟我如数家珍

地讲述苏美尔文明。他看着埃及莎草纸上的神话图谱非常专注,或许在他翻译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的时候也会联想到这些活生生的文物吧。现实生活中的何老师似乎是“单调”的,一切世俗的享乐与他无关。而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文化想象的天空却是无比广阔恢宏,这是不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呢?

由此我想到两位学术大家,也是翻译界的巨擘。一位是王国维。他早年写《叔本华与尼采》讲过一段话:“赤子者,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在他看来,凡作大学问的或大诗人,都必有一颗赤子之心。另一位是傅雷。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给自己儿子写的信里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赤子之心,是纯净到童蒙状态的求知欲,是对于人类智慧创造的由衷的倾赞和礼拜,是虚怀若谷而又自信自足的心态。世间学者也许学问和贡献有大小,悟道有先后,但是赤子之心是相通的。我在与何老师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时常感受到他的出乎天性的纯净,这是和他的年龄、和他的阅历、和他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在何老师那么丰富广博的学术译著和论著的深处,我每每为之感动的正是这种纯净和安宁。

何老师大我一个学术辈分,但是由于“文革”动乱的原因,我们这两辈人基本上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80 年代是奋力冲破蒙昧、探索真理的年代。久违的西方知识界以其丰富多彩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中国学术也一度因此进退失据,张皇失措,在西方学术话语面前自惭形秽,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西学东渐,对于传播学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来者,更是如此。可以说,西学的译介决定了这个新学科的基本知识架构。这是幸之不幸。而传播学界因为有了何道宽这样诚实的学者和忠实的译者,又是不幸之幸了。何老师在第一次获美国新闻署的邀请访美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交融的趋势,对于麦克卢汉、施拉姆、霍尔等传播学大家的理论心有戚戚。对于一位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将沟通中西文化作为毕生的志业,不可谓不弘毅!文

化是何等辉煌、何等复杂的存在。而何老师甘愿化身为一座津梁，在两者之间进行语言的搭建，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踏着他的文字身躯，去借得他山之石。在过去，这种学术翻译无异于自动放弃学术资源垄断权；在今天，学术翻译未必可以得到学术管理体制的公允评价。但是，西方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想的源源不断地输入，却使得众多的读者从中受益。这些年何老师的声誉日隆，多来自读书界的口碑，这是对何老师辛勤劳作的最公道的回应，可谓最纯净的湖面才能反映最真实美丽的风景。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这用以描述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不无贴切之处。最好的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与活跃，无穷的问题纷至沓来，带来了一切新的思考和探索的契机；空前便捷的媒体工具，海量的学术资源供给，大大提高的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对于文化创造的广泛渴求成为全社会的期待。而最坏的年代，则是在知识界充斥了更多的权力和金钱的染指，其染指的深度在于动摇了在我们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的学术良知。智慧和愚昧不再是一对矛盾，而是互相渗透的存在物。似乎有更多的智者追名逐利正在做着从历史角度而言（甚至从其个人生涯而言）完全愚昧的事情；而何道宽这样的诚实而单纯的学者，却做着似乎“愚昧”笨拙的劳工。“何道宽现象”足以让更多在学术圈讨生活的人们警醒，孰者为智，孰者为愚？思及此处，也不免自问，夜深人静，正好是扣心自诛之时。当此序言罢笔之时，何老师大约已经起身开始了他新一天的工作吧？愿他健康长寿，愿他永远年轻，永远作我们大家前行的好榜样！

写于 2013 年 2 月 7 日凌晨四点

序三 培本固基 传诸后世

景海峰

道宽先生的《夙兴集》将要面世,这部集结了近 50 篇文章的著作颇为独特,多为译著的长篇序跋和学术评论,可以说是作者近十年来问学求道的真实写照和硕果之聚合。夙兴者,勤奋不懈也。《诗》云:“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先生以退休之身,穷十年之功,焚膏继晷,矻矻终日,致力于译事,传播新知,将 40 余种、1 200 万字的译作奉献给读者,成为近年来少有的标杆性高产译家,在我国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荣膺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除了勤奋、多产之外,先生的学养和视野也令人钦佩,此书所涉及的内容以传播学为主,亦伸达跨文化研究、文明史、媒介史、文化交流史、人类学,乃至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可谓堂庑甚广,有一种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感觉,且先生的译作多为学科前沿之新鲜话题,对我等启迪良多,直令受益无穷。

道宽先生的译事虽说以传播学科为主体,但绝非时下花样翻新之末道小技耳!其所瞩目者为学术根底之大问题,所选介者多为有理论功底和哲学素养的大家,如施拉姆、麦克卢汉、伊尼斯、莱文森等人,特别是北美流行的媒介环境学派。这和二战之后流行的后现代文化与哲学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呼应关系,如果想要一探当代西方文化之究竟,此为不可不知者也。其他,如莫利斯之“裸猿三部曲”、赫伊津哈古典人文学之著等,皆为相关领域里已成为经典的作品,不可不读。所以,先生之译事绝非为时尚所牵引,而只为了学术之培本固基也,这是其寄意所在。本着这样的学术情怀,他厌恶粗制滥造的市场导向,强调译家的责任感和学者的良知心,在选题和方法上颇费了心思,对译作每每反复研读,加以深思,周知其意,确保经手之著作能够在中文世界里传诸后世。

书中所收的大部分序跋，不仅展示了道宽先生对于这些著作的细心研读和独到体会，以及在心灵世界里与撰主们的沟通与交流；而且表达了他对如何传通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化知识，使之鲜活地嫁接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的理解与思考。如果说创作是生成意义，那么翻译则是传达意义，这就绝不仅仅是语词、文句转换之类理解那么简单的一件事。翻译不仅仅是处理词句文法，而是需要层层揭开意义本身的无穷之幕，意义是由无数的文化元素所包裹的，对于这些元素的抖落越是充分，则意义就越为显豁。在这个意思上，好的翻译应该是复现意义、重构意义的一个工作过程，尤其对于意蕴深刻的经典文本来说，更是如此。海通以来，西学渐兴，译业大盛，人才辈出，译家多瞩目于语文学的传通问题，以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标准，基本上是把翻译看做一件语文学的工作，而很少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去理解。像早年王国维搞翻译讲“知人论世”，认为文化疆界“非徒在语言文字而已”，提出翻译者必须“老于本国之学”，才能够深知他种文化之妙趣等，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哲学诠释学兴起之后，对于翻译的理解与解释早已经不是严、王时代的模样了，但一般人的“常理”还是落在语文学眼界的套子里面，而难得有新的境界。伽达默尔指出：翻译实际上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一个译者不管如何设身处地、想象着把自己变成作者，他都不可能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只能是对文本的一种“再制作”。这样，翻译就不可能是所谓“忠于”的、“原始”的，而只能是包含了变化意义的“再”，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的过程。通常，翻译总是要有所取舍的，译者不可能把原文中的所有意义都表现出来，既有对意义含糊的清晰化，也有对意义的误读、错判和隐匿化，译者对于文本而言，明显地拥有一种标记和显现的权力，他一定会把具体的视域和独特的理解植入自己的翻译当中。翻译实际上就是意义唤起的过程，好的翻译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唤起意义，并且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之中生成了新的意义。

道宽先生的书中涉及了对翻译问题的新理解和新认识，也特别重视跨文化交际与传通的一些基础理论探讨，尤其是通过他呕心沥血的翻译实践活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本与阅读、语际转换，以及理解与解释和意义建构等问题，提供了非常

丰富的路径,值得好好研究。十年来,先生每出一书,必惦记相赠,经年累月,已是盈箱满架,好不壮观,我从这些书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了解到所涉及学科的前沿状况,受益匪浅,心存感激。值此先生以序相嘱,本为外行,哪敢置喙,殷殷难却,聊作数语,以为多年情意之答谢。

2013 年元宵节于深圳海阔天空

自序：把学问做下去，直至永远

吾从教 50 年，著述 30 年，问世文字逾 1500 万。“不逾矩”之年后出一集子，借以反映我一个方面的功夫，取名《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

“夙兴”是我十余年来的生活写照：闻鸡起舞。“夙兴”约为寅时，正值乡间鸡叫头遍。“起舞”则是在电脑键盘上“码字”。

年轻气盛、献身教学时，不但“夙兴”，而且“夜寐”，蜡烛两头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拼命读书，准备“写字”。

1999 年，撰写《中华文明摘要》即将杀青，又单枪匹马准备开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第三届双年会暨国际讨论会。有半年时间，极度紧张，恐有疏漏，常夜半噩梦，再难入睡，不如起床“码字”。自此不再“夜寐”，专求“夙兴”。“夙兴”可一举多得：凌晨头脑清醒、“出活快”；“众人皆睡我独醒”，得意洋洋；上午坐班前写点东西“垫底”后，心里不慌。

自此的十余年里，我早睡早起，晚 9 点睡，凌晨 3 点起床；工作实行“4-3-3”制：早餐前工作 4 小时、上午工作 3 小时、下午工作 3 小时，晚上休息，每天能“码字”三千以上。

古稀之后，在家人、友朋和医生警告下，将每天 10 小时工作减为 9 小时，实行“3-3-3”制，尽量不要在凌晨 4 点之前起身干活。工作时间减少，但出活并不减少。

究其原因，不外有四：① 脑子似乎越来越灵便，因为人文社科的各门学科是彼此相通的；② 写作翻译越来越得心应手；③ 电脑工具越来越好使；④ 互联网和云计算使“一切”信息唾手可得，将脑子从繁重而枯燥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的写作和翻译。

今年是我来深圳大学工作 20 周年,又值深圳大学建校 30 周年,此刻出版《夙兴集》,最深刻的感悟是——

(1)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求无涯,其乐无穷。

(2) 学者应该主动流放自己。地域上的流放可打开别外洞天。每次流放,学问都上一个台阶。1987 年投奔南京大学外文系陈嘉教授读硕,美国文学洞开大门。1980 年留美一年,接触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决心把麦克卢汉和爱德华·霍尔介绍给中国读者,自此一条腿迈入比较文化和传播学。1993 年,在小平南巡讲话的感召之下,在“知天命”之后进入人才济济的深圳大学,良性竞争又把我“逼”上一个新台阶。

(3) 学科上的流放产生新的动力。1995 年,我参与组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团队的力量促使我深化比较文化研究。2001 年,我“闯进”中国传播学会年会,从此开始大张旗鼓地译介麦克卢汉及其学派媒介环境学。

(4) 母校四川外语学院艰苦奋斗的学风使我终生受益,使我明白:小学校也能做大学问,也能养育蓝仁哲、杨武能、刘小枫、邓正来这样的大学者。

(5) 新兴的深圳大学也能创造奇迹。2005 年,我应邀在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年会上致词时,曾经“狂妄地”预测,不出十年,深圳大学就可以跻身前列。谁知不出几年,她就完成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人才培养的“三级跳”。

(6) 文科学者老而弥坚、炉火纯青。只要脑子好使,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学问。以我为例,我的学问井喷期和巅峰期是在退休以后到来的。自 2002 年退休以来的 11 年间,我出版的著作和译作 50 来种,逾 1 200 万字,加上退休前的 300 万字,我的著、译、论已逾 1 500 万字。

《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收录文章 40 篇,共八章:借火与播火;麦克卢汉研究;媒介环境学研究;伊尼斯研究;莱文森研究;其他传播学学派研究;文化史、媒介史、传播史、人类学及其他;心路与足迹。书名里的三个关键词“闻道、播火、摆渡”是我 30 年来的学问追求。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发蒙的读物是儒学经典《四书》，稍长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誓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0世纪80年代初游学海外一年后，决心脚踏东西文化，既“盗火”，又“播火”，一边引进学术经典，一边回到中国经典。本书第一章“借火与播火”就是这个双重使命的点滴成果。

我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本书第七至十篇倾注了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心血。《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讴歌中国文化的无穷生命力。《和而不同息纷争》的英文版题名“Chinese Legacy for This Eventful World: Harmony Allowing Diversity”宣示了一个坚定信念：中国文化是救世良方。

第二至六章集中精力在一门学科中“盗火”与“播火”。这门学科就是积极成为显学的传播学。我将麦克卢汉的精华和研究他的精华尽可能“一网打尽”。他的《理解媒介》已由我出了三版中译本，其中的第二版（商务，2000）还进入了“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其中的第三版“增订评注本”是麦克卢汉研究第三次高潮的标志之一。

第七章反映我广阔的人文社科视野，涉及文化史、媒介史、传播史、人类学、政治学。限于本书篇幅，我在哲学、艺术、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的著述和译作就难以旁及了。

第八章“心路与足迹”追寻和回眸我的治学历程，第40篇“架桥铺路、沟通中西是我的梦想”勾勒了我摆渡人的身份。

我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涉猎，对中华文明略有感悟，对人文社科翻译情有独钟，在比较文化、传播学研究上用力最勤。《夙兴集》从诸多方面反映了我的追求和梦想。

何道宽

2013年2月13日

目 录

序一 他为人类才智的地球村铺路 / 保罗·莱文森 / 1

序二 我看“何道宽现象” / 吴予敏 / 1

序三 培本固基 传诸后世 / 景海峰 / 1

自序：把学问做下去，直至永远 / 1

第一章 借火与播火

1 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	3
2 比较文化之我见	9
3 比较文化的新局面：评国内首批跨文化交际学专著	15
4 《无声的语言》译者序	21
5 《超越文化》第一版序	35
6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崇“二”心理定势	38
7 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	48
8 简论中国人的隐私	62
9 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72
10 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	79

第二章 麦克卢汉研究

11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播种者和解放者	99
----------------------------	----

12	《理解媒介》译者序跋	144
13	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	154
14	《机器新娘》译者序	167
15	《麦克卢汉书简》译者序	173

第三章 媒介环境学研究

16	“媒介环境学译丛”总序	187
17	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一	190
18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	198
19	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评析	211
20	《技术垄断》译者序	221
21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译者序	239

第四章 伊尼斯研究

22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译者序	259
23	《帝国与传播》第一版译者序	271
24	《传播的偏向》第二版译者序	280

第五章 莱文森研究

25	《莱文森：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立体型的多面手》	291
26	《数字麦克卢汉》译者序	327
27	《手机》译者序	333
28	《软利器》译者序	340

第六章 其他传播学学派研究

29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译者序	347
30	《传播学批判研究》译者序	356
31	《传播学概论》译者序	367

第七章 文化史、媒介史、传播史、人类学及其他

32	游戏、文化、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	383
----	---------------------------	-----

33	《中世纪的秋天》译者序	404
34	《17世纪的荷兰文明》译者序	418
35	《字母表效应》译者序	430
36	《与社会学同游》译者序	436
37	《裸猿》第一二版译者序	456
38	《菊与刀》译者序	465

第八章 心路与足迹

39	学术小传：架桥铺路、沟通中西是我的梦想	475
40	奋斗与奉献	483

附录

一、山高水长：记何道宽先生 / 郁龙余	492
二、传播思想史的先行者 / 陈世敏	496
三、从跨文化研究到媒介环境学 / 林文刚	497

后记	498
----------	-----